

永嘉玄觉《证道歌》日本注本七种叙录

李 滔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11)

摘要：永嘉玄觉《证道歌》自平安时代传入日本后便受到日本佛教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无论在禅风大炽的“五山时期”，还是江户前期的禅宗复兴阶段，《证道歌》在各种佛教运动中都被视为弘法利器。对于《证道歌》这篇义理丰富、形式独特的歌辞，日本学者除借助中国注本理解其奥义外，也尝试自撰注本。所见十余种注本，多为江户、明治时期曹洞宗僧所作，各有特色，反映了《证道歌》在日本被接受和阐释逐步深化的过程，也彰显了《证道歌》在日本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不俗影响。

关键词：永嘉；玄觉；《证道歌》；传道歌辞；中日禅宗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25)02-0050-13

DOI：10.20107/j.wzus.202406054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https://xbsk.wzu.edu.cn> 获得

唐代永嘉大师玄觉（665—713）创作的长篇唱道歌辞《证道歌》，唐时又称《曹溪禅师证道歌》《最上乘佛性歌》《见道性歌》《道性歌》，至迟在唐文宗开成年间就已传入日本。入华日僧圆仁（793—864）所著《入唐新求圣教目录》《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圆珍（814—891）所著《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智证大师请来目录》《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以及慧运（798—870）所著《将来教法目录》等，分别记载了他们在求法旅途中获赠和抄写《证道歌》文本并将其携归日本的经历。其后，唐代释净居、宋代释彦琪、宋代释知讷、元代释永盛所著之《证道歌》注本、颂本亦相继传入东瀛。其中，释彦琪、释知讷之注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尤其受到江户时期曹洞宗僧众的重视。

日本佛教界人士深究《证道歌》奥旨，在借助传日《证道歌》注本理解这篇禅宗经典的同时，也自撰注本。今遍检日本各大文库，共得《证道歌》日本注本名目 15 种，惜全文可见者仅 7 种，其中含汉文注本 6 种，日文注本 1 种。由于这些古注本至今尚未得到关注和整理，因此下拟按其写作年代，对其注者生平、版本源流、写作原因、注释体例、注文特点等作简要介绍，并就这 7 种注本之特征所大致呈现出的《证道歌》注解史，以及《证道歌》在日传播相关问题等略作总结和论述，以供学人参考。

一、《证道歌注解》

《证道歌注解》一卷，南英谦宗著。南英谦宗（1387—1460），俗姓藤，号三谦道人，因先后居京都耕云寺、新潟种月寺，又号耕云种月，萨摩人，曹洞宗僧，太源派第四世。髫年于京都相国寺出家，师从杰堂能胜（1355—1427），十九岁游方问道，习文字禅，二十九岁于耕云寺开

基金项目：温州大学侨特色研究重点项目（WDQT21-ZD003）

作者简介：李滔，男，四川泸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明文学，文献学。

悟。永享七年（1435），航海入明，此后四年挂锡于天童山（今属浙江宁波）景德寺，永享十一年（1439）归国。除《证道歌注解》外，尚有《五位秘诀》《三易讎校私钞》《信心铭拈锤》《宝镜三昧注》《伝法偈下语》《参同契宝镜三昧解》《鼓缶轩记并同续篇》《重离叠变诀》《尖活说》《鼠璞辨》等十余种著述。传见《日本洞上联灯录》卷五。

《证道歌注解》是《证道歌》日本注本中写作年代最早的本子，有天正八年（1580）存庆野钞本，藏驹泽大学，封面题“骨董证道歌耕云种月注解”。“骨董”与“古董”同义，日本收藏家所收书、画、刀、剑、陶器等古物皆称“骨董”。“骨董证道歌”之名，盖为该书抄写者存庆野所加。书前题“普佛七代存庆和尚之法曾孙予书续，耕云一脉之秘书，放末孙子之附书，祚唱少净仁”，又题“光录寺十七祖兼总类十代长福六经樵摇堂任翁益运口”。正文有假名训读符号，偶有以小字疏解注文者，当为存庆野之手笔。书后写“任翁益运叟书续，于时天正八庚辰二月廿二日，桂谷兰若仁而十六拾五之存庆野拙书之毕也”云云。

中国禅宗南派自六祖慧能去世以后逐渐分流为两系五家七宗。《证道歌》作为重要禅宗经典，尤其为各宗禅师重视。在禅师上堂开示场合中，往往屡现《证道歌》身影。据粗略统计，唐宋时期各禅语录中引《证道歌》章句就达80余次^[1]，《证道歌》之核心命题、所用俗语、修行方法、修辞手法、箴言警句等皆对禅语录产生重要影响^[2]。不过，以语录形式注解《证道歌》全篇，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唐宋禅门尚无先例，至南英谦宗方始。《证道歌注解》即为南英谦宗开堂讲授《证道歌》时弟子所记录其言行片段之汇总，与此相应，该书注解风格偏重“解”而轻于“注”，偏重体悟而轻于考证，偏重开示而轻于概念辨析，并不采用传统注本中长篇援引经律论疏的习惯做法，这也是该书自称“注解”而非“注”之原因。讲解《证道歌》章句时，南英谦宗往往先向弟子发问某概念“作么生”“还会么”，弟子各发己见，而后南英谦宗旁征古德言语，继续发问使弟子明悟，有时还以具有总结意味的“月云”结尾，试举二例以明：

君不见 （月云：“汝诸人作么生‘见君’？”）众各下语。月云：“手把红罗扇遮面，乃云直须着眼见。‘见君’，作么生‘见君’？古德曰：‘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方始休。’”月云：“学道先须有悟由。”便取拂子竖起，云：“汝诸人作么生见报道是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便安于旧处。‘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方始休’。休底又如何？”拂子。

比来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须剖析 （月云：“未磨与剖析，如何辨别？此去汉阳不远，黄鹤楼前鹦鹉洲。”云：“诸人还会么？”自代云：“勿气息。”云：“居舜禅师问洞山：‘古镜未磨时如何？’山曰：‘此去汉阳不远。’云：‘磨后如何？’山云：‘黄鹤楼前鹦鹉洲。’师于言下大悟。”月云：“古镜未磨时如何？此去汉阳不远，勿气息。磨后如何？黄鹤楼前鹦鹉洲，勿气息。”乃问云：“磨与未磨，但知那个是古镜？”自代一拍，云：“正好相见。”

除以语言启示弟子外，南英谦宗有时还辅以动作，如“竖起拂子”“一拍”“弹指一下”“唏嘘一声”“敲柱三下”“振锡一下”等，这使其讲解充满很强的表现力。

南英谦宗少习文字禅，又有在中国参禅学道的经历，因而对中国禅师语录很熟悉。在《证道歌注解》中，面对复杂的佛学概念、命题，他往往能从各语录中找到相应的典故以启悟弟子。例

[1] 李滔.《永嘉证道歌》校释与研究[D].温州：温州大学，2021：82-91.

[2] 李滔，王小盾.禅语录和《永嘉证道歌》[J].古典文学知识，2021（2）：36-44.

如上段注文提到的“云居舜”，即为生活在北宋嘉祐年间的云居晓舜禅师，谈到的这段对话出自宋代慧觉洪范所作之《林间录》，讨论的“古镜未磨”实际上也是禅宗史上老生常谈的公案。除此之外，《证道歌注解》还征引了黄龙南禅师、风穴延沼禅师、白马照禅师、龙窟禅师、鹅湖和尚、永明延寿之语，以及怀度和尚、寒山之诗歌作品。而其引用佛典，仅有《宝藏论》《涅槃经》《如来藏经》等数种，数量较少。

《证道歌注解》以师生对话形式注解《证道歌》全篇，在中日禅宗史上都属首次。然而，该书大量使用禅话和术语，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尚有阅读难度。尤其是其中一些注文，似与《证道歌》原文不甚相关，颇令人费解。此书仅流通于曹洞宗内部，存庆野钞本后便无重刊。不过，作为《证道歌》日本注本的发端之作，《证道歌注解》仍有其价值，即代表了早期日本曹洞宗僧注解《证道歌》的尝试，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此书还欠缺注本的一些基本要素。而南英谦宗作为曹洞宗太源派的重要人物，为学徒讲授《证道歌》，并且因其记录得以保留而成为日本禅宗史上第一位《证道歌》注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证道歌》在日本的知名度。

二、《证道歌钞》

《证道歌钞》一卷，万安英种著。万安英种（1591—1654），武州江府（今属江户）人，曹洞宗僧，俗姓远山，自称千拙，九岁起随其叔父、京都起云寺源室和尚作行童，十一岁得度并受具，此后五年参学于滋贺总宁寺。源室去世后，万安英种承其衣钵，任起云寺住持十年。晚年因受日本佛教宗风斗争之波及，先后隐居丹波（今属京都）瑞岩寺、摄津（今属横滨）临南寺，承应三年（1654）八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传见《日本洞上联灯录》卷一〇。

自“应仁之乱”（1467—1477）后，以曹洞宗为代表的日本禅宗逐渐衰颓，僧侣精神堕落，宗风萎靡不振。至万安英种主持起云寺时，官府又加强了对禅宗的控制，“当时，江府诸山与僧司是非宗义，取决于官衙，一以禅暨铁心为之证”^[3]，将官员意志凌驾于禅教之上，并歪曲教义。万安英种对这种现状深感不满和担忧，曹洞宗僧传记载其曾“深嗟宗风衰废，与同志禅侣六七为伍，杜门打坐者凡六年”^[4]，此后又重出山门，“以大法为己任，全身担荷……与一时有道尊宿愚堂大愚、云居一丝、龙溪等内交与偕激励，希回古风”^[5]，并以实际行动投身到复兴禅宗的事业之中。万安英种对日本禅宗的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为江户前期禅宗之复兴大建弘法道场，开辟禅院三十余所。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庆安二年（1649），应山城淀藩主永井尚政（1587—1668）之邀请，主持重建毁于兵火的宇治兴圣寺^[6]。其二是专事著述，力图以此矫正宗风。他为禅宗复兴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宗义注释之作，如《永平录钞》《无门关钞》《禅林类聚撮要钞》《人天眼目钞》《兴圣寺本大慧书钞》《江湖风月集略注钞》《五家正宗赞钞》《真歇和尚劫外录钞》《真歇和尚拈古钞》《禅仪外文钞》《大慧普觉禅师书钞》《大智禅师偈颂钞》《投子录钞》《临济语录钞》等。

在万安英种生活的年代，已有出版家将《证道歌》《信心铭》《十牛图颂》《普劝坐禅仪》等

[3] 岭南秀恕. 日本洞上联灯录[M]. 东京：鸿盟社，1885：32.

[4] 岭南秀恕. 日本洞上联灯录[M]. 东京：鸿盟社，1885：31.

[5] 岭南秀恕. 日本洞上联灯录[M]. 东京：鸿盟社，1885：31-32.

[6] 兴圣寺为日本曹洞宗始祖道元（1200—1253）从中国学禅归国后，于天福元年（1233）在宇治郡（今属京都）建立的第一所曹洞宗寺庙，曾一度作为该宗弘法之“根本道场”，后被遗弃并毁于兵火。

四种短篇禅宗要典汇刻为《禅宗四部录》。在禅风颓靡的江户前期，一心提倡复古的万安英种，自然也关注到这四种古书的价值，于是分别写作了《证道歌钞》《信心铭钞》《十牛图颂钞》《坐禅仪钞》等四种注书，并冠名为《四部录钞》，将之作为重振禅门古风的一种方式。

《证道歌钞》是第一部以日文注释《证道歌》的著作，现存三种刻本^[7]。其一是宽永十年（1633）刻《四部录钞》本。日本京都大学、驹泽大学均有藏。书后题：“此集ハ日本ニテ諸錄ヨリ板テ集ル，是ニ無量壽佛師ノ日用清規ヲ，添テ五味ノ禪ト名ルソ，今マ四部錄ト云ハ，何人ノ名クル處ソヤアマリ大ナル，題目ソ。”大意为：“此集从各语录中选编而成，名《四部录》，其编者已不可考。亦有在《四部录》中增入无量宗寿禅师《日用清规》而称《五味禅》者。”书末板框题“宽永癸酉夏五谷且中野市右衙門新刊”。其二是正保四年（1647）刻《四部录钞》本。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有藏。书末题“正保四（丁亥）洛阳三条通菱屋町林甚右衙門”。板式与宽永本相同。其三是庆安元年（1648）刻《四部录钞》本。京都大学、驹泽大学有藏。板式与宽永本相同。正文首行题“永嘉真觉大师证道歌”，后附玄觉小传。书末题“斯书先是虽流布于世，文字训点舛謬甚多，今加订正，毕，于剗劂之工云。庆安元历初冬吉”。

同南英谦宗《证道歌注解》相比，《证道歌抄》已经具备学理意义上的注本要素。该书一般以《证道歌》二至三句为单位进行注释。总体而言，注文意达则止，无多阐释，除一些词句引证《宝藏论》《十诵律》《祖庭事苑》《韵府》^[8]外，一般不多引典籍。如释“君不见”云：“是ハ發端ノ辭也，君ハ諸人指ヲナリ。”意为：“发端之辞也，‘君’指诸人。”再如，释“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云：“攝，ハ引持也，又摠也，錄也，又兼也，又牧也，註一月喻於一心，一切水ハ喻諸世間也。”意为：“摄，有引持、摠、录、兼、牧等多种含义，‘一月’譬喻内心，‘一切水’譬喻世间万象。”对于复杂的典故，如“降龙钵，解虎锡”“勇施犯重悟无生”“有二比丘犯淫杀”等，万安英种多采知讷之注，引证时称“本注云”。

万安英种一生致力于复兴禅学，晚年虽屡遭官府打压，但依然受到众多学徒的追随，其社会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他的《四部录钞》一经问世，便得多次刊行，流布四方。继南英谦宗《证道歌注解》问世的二百多年后，《证道歌》也经由此书再度被推介和重视。《证道歌钞》的面世，意味着《证道歌》在日本已经产生了第一部学理意义上的注本，在此之后，《证道歌》日本注本也开始走向规范和完善。

三、《证道歌注》

《证道歌注》一卷，毛利贞斋著。毛利贞斋，生卒年不详，应与万安英种为同时期人，又名毛利瑚珀，字虚白，号洛滋隐士，大阪人，常居京都开堂授课。毛利贞斋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家，其学问于儒、释、道、文学、小学等均有所涉。其著述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是音韵辞书类，如《韵镜袖中钞人名反切续编愚蒙记》《韵镜袖中秘伝钞》《韵镜名乘字大成》《韵镜秘诀袖中钞》《三

[7] 关于此书版本，日本学者龙谷孝道、金田弘曾撰文讨论，可参看：龙谷孝道. 浄眼寺所藏《証道歌钞》について：中世曹洞宗における学人接化[J]. 曹洞宗研究员研究纪要, 1987: 59-79; 龙谷孝道. 浄眼寺所藏《証道歌钞》翻刻[J]. 驹泽大学大学院佛教学研究会年报, 2011: 37-57; 金田弘. 伊勢淨眼寺所藏《証道歌抄》とその言語[J]. 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 1987: 1-14。

[8] 万安英种《证道歌钞》与毛利贞斋《证道歌注》在注文中皆引用了《韵府》一书。《韵府》应为宋末元初人阴幼遇所著之《韵府群玉》，自清代官修《佩文韵府》问世后，此书已不传世。

重韵大成》《三重韵订补》《伊吕波韵》《会玉篇首书》《增续广益玉编大全》《鳌头助语辞》《字韵早鉴大成》《类字笺解》；其二是儒家经典注释类，如《易学启蒙合解评林》《孝经大义详略大全》《孝经直注》《四书集注俚谚钞》《大学章句注》《大学章句俚谚钞》《中庸章句俚谚钞》《孟子集注俚谚钞》《论语集注俚谚钞》《二十四孝仮名钞》；其三为佛教经典注释类，如《四部录注》《四部录增钞》《护法论备考》《女人血盆经和谈钞》《首书戒杀放生文》等；其四为汉诗文注释类，如《九相诗首书钞》《歌行诗首书》《古文真宝后集合解评林》《古文真宝后集备考》《初学指南钞》《补正初学指南钞》等。这些著作皆在日本民间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毛利贞斋《证道歌注》存于其所著《四部录注》之内，刊行时间晚万安英种《证道歌钞》首刻本近四十年，有宽文十二年（1672）书林堂刻本，现存驹泽大学。该书篇幅不长，仅十三页，注文位于天头及左右两侧，所释语词皆用矩形框标注。

《证道歌注》主要以征引代替注释，即多数只注明某概念、某典故出自何书何卷，不掺杂毛利贞斋的释义，并常采用“事详见某书某卷”的简叙方式。如释“达磨”云“《传灯录》卷三可见也”，释“传灯”云“《书言故事》卷四《僧传》：‘度小师谓传灯’，事详见《大般若经》卷四百八及《维广经》《华严经》等”。与万安英种《证道歌钞》多引知讷注文不同，毛利贞斋选择以释彦琪注本为参考，征引时称“琪和尚注云”，或直称“注云”“注”。《证道歌注》全书共42条注释，其中引释彦琪注文达18条，几占其半。此外，因毛利贞斋读书涉猎广博，其注所采用书目数量及类型比前文所叙二种注本稍多。除《俱舍论》《宗番注圆觉经》《大智度论》《维广经》《大般若经》《景德传灯录》《祖庭事苑》《释氏要览》《五灯会元》等方外之书外，小学之书如《字汇》《韵府》，诸子之书如《论语》《庄子》《孟子》，文学之书如《文选》《千家诗注》《书言故事》等，也都在《证道歌注》征引之列。

从作者身份来看，《证道歌》注者多为禅宗僧人，在日本又多为曹洞宗僧，而毛利贞斋则是《证道歌》注解史上第一位以非佛教徒身份为《证道歌》作注之人。不过，毛利贞斋学问驳杂，其著述颇有贪多求全之嫌，因而这部《证道歌注》显得简而不深，许多条目都只有寥寥数语，只能算作一种“简注”。但这也表明，包含《证道歌》《十牛图颂》《信心铭》在内的中国禅籍已在江户前期走出丛林，为社会文化人士所关注。

四、《冠鳌证道歌》

《冠鳌证道歌》一卷，骏阳陈人著^[9]。骏阳陈人，生卒年不详，号岩峰叟。其所著《冠鳌证道歌》存于《冠鳌四部录》之内。《冠鳌四部录》，亦称《首书四部录》，有元禄十一年（1698）刻本、明治九年（1876）文昌堂刻本，后者系前者翻刻，两种刻本分别藏于日本东北大学、驹泽大学。该书注文凡所征引文字，皆详细标明来源书籍卷次及页码。其序云：

夫斯《四部录》本散在诸录者，于本刊辑为一部，而题之名，盖例《四家语录》者欤？其编集者竟莫知原于谁。余看本刊梓行本，往往有语意不快者，（走）昔游泳于江湖时获蠹损，一求续阅之，其义炳然，唱叹其持也，尚矣！一日，恐看斯录，人搜旧本，差谬以千里，时考典籍，正事迹，令之冠鳌。既遂，锓木以广。间失考正者，俟后之君子云尔。时元禄十一龙集慈雍摄提格林钟中澣日。骏阳陈人岩峰叟并腊之胡。元禄十一

[9] 关于此书作者，《国书总目录》《南养寺所藏史料集》作“骏阳山人”，大森曹玄所撰《禅宗四部录训注》、陆川堆云所著《臨濟及臨濟錄の研究》、驹泽大学图书馆所编《新纂禅籍目录》作“骏阳陈人”，此处依后者。

戊寅岁九月吉且。

据此，《冠鳌证道歌》旨在“考典籍，正事迹”，因而其注人名、注概念、注典故都颇有“考镜源流”之风，如释“大师”与“如意珠”云：

大师 《起信笔削记》：“大师者，德业高胜，可轨可范，即十号中‘天人师一号’也。”《事物纪原》曰：“姚秦又号罗什，为大师，则大师之名盖起于此。”《释氏要览》：“《僧史略》云：‘肇自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十四日延庆节内道场谈论，左街云颢赐三慧大师，右街僧彻赐净光大师，可孚赐法智大师，重谦赐青莲大师，此为始也。’”

如意珠 《楞严四》：“譬如有人于白衣中系如意珠，不自觉知，穷露他方，乞食驰走，虽实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愿从心，致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名义》：“末尼珠。”《注大论》云：“如意珠，状如芥粟。”又云：“如意珠出自佛舍利，若法没尽时，诸舍利皆变为如意珠。”《观经》指如意为摩尼。《天台》云：“摩尼者，如意也。”

与毛利贞斋《证道歌注》相近，骏阳陈人《冠鳌证道歌》大多都只引不释，但也偶有阐发之处，如释“去圣远”云“考年代，佛灭至永嘉示寂，千六百六十年，渐入末法初”，释“穷释子”先言“犹言贫穷之释种子”而后引《增一阿含经》论证。不过，毛利贞斋对那些“差谬以千里”的注书并未直接回应。

骏阳陈人和毛利贞斋同为江户时期的学问家，又都为教外人士，二人的《证道歌》注本在风格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即：均重视广采典籍以释证，所引证书目打破了释家者流主要以佛书释证《证道歌》的惯例。除引《大乘义章》《涅槃经》《楞严义疏》《观经疏》《止观弘决》《华严大疏》《俱舍论》《六波罗密经》《圆觉略疏》《大智度论》《注维摩诘所说经》《大乘起信论疏笔削记》《法华经》《六祖坛经》《宋高僧传》《大宋僧史略》《续释氏稽古略》《佛祖通载》《涅槃经》《五灯会元》《佛性论》《四教集解》《临济录》《僧祇律》《佛地论》《心地观经》《圆悟录》《祖庭事苑》《释氏要览》《诸经要集》《五家正宗赞》《法华三大部补注》《虚堂录》《圆悟录》《碧岩录》《百丈录》等佛教经律论疏、禅宗史传语录等数十种佛教典籍外，《冠鳌证道歌》还使用了《诗经》《道德经》《论语》《庄子》《孟子》《孔子家语》《史记》《汉书》《四书蒙引》《小补韵会》《五音集韵》《玉篇》《字汇》《事物纪原》《大明一统志》等佛教以外的书籍作注。

相比其他注本，《冠鳌证道歌》主要特色有两点。其一，在所有《证道歌》注本中，该书征引书目种类最繁、数量最多，粗略统计达五十余种，经、史、子在内的中国典籍皆囊括在内。其二，该书详尽罗列与所释语词相关的文献条目，并重视介绍他人之注，如常引宋僧释彦琪、元僧释永盛之注文。从这一角度而言，此书又具有“集注”性质。

从毛利贞斋到骏阳陈人，意味着《证道歌》在日本的注解已经摆脱前期的草创阶段而走向了更加学术化的道路。

五、《证道歌直截》

《证道歌直截》二卷，万回一线著。万回一线（？—1756），号钝者和尚，曹洞宗僧，摄津（今属横滨）总持寺住持。除《证道歌直截》外，还著有《信心铭拈提事略》《重离辨》《青鵠原梦语》《洞宗通翼》《洞上古辙钟瓮闻解》等书。

《证道歌直截》，亦有称《大乘决疑经直截》者，写作于元文元年（1736），成书次年即付梓

杀青。现存元文二年（1737）诹访山刻本，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10]。该书序文向读者解释了写作及命名之缘由：

永嘉大师所著《证道歌》者，盖是圆顿之宗极，直指之要机也，非止文笔赞咏矣！琪注、盛注行于世久矣，可惜环中未尽，玄奥太远，钝者有感发乎大师之余韵，而不揣愚贱，为之别注。其直截根源者，法王之所印，大师之所望也，是故标以为名焉。读者莫摘叶寻枝，则庶乎。元文改元丙辰秋九月十二日。痴钝者一线自序。

书后又云：

元文丁巳之春，阖山清众一万余指敦请钝者和尚提唱《碧岩录》，且其所著《证道歌直截》者，一本二册，同志乞以谋上梓流通，不日而成，遂藏其板于本山大讲堂，伏冀法宝永住，策发后昆者也。武州江户吉祥精舍藏主比丘发道谨志。

“直截”，乃取自《证道歌》“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之语也。“直截根源”为《证道歌》之核心命题，意为直截了当地追溯万法根源，洞悉法界实相，最终达到涅槃境界。这句警策之语常被宋代禅师称引，如《景德传灯录》卷一〇《邓州香严下堂义端禅师》载：“僧问：‘如何是直截根源？’师乃掷下拄杖，入方丈。”^[11]又卷一一《邓州香严智闲禅师》载：“问：‘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师抛下拄杖，散手去。”^[12]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景德传灯录》卷一三《汝州风穴延沼禅师》、卷二三《随城山护国知远演化大师》，《天圣广灯录》卷一八《袁州南源山楚圆禅师》、卷二一《蕲州四祖山諲禅师》，《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一四《金宁保宁仁勇禅师》、卷二一《东京大相国寺智海禅院佛印禅师》，《嘉泰普灯录》卷一《怀安军云顶德敷禅师》、卷二六《泐潭湛堂准禅师》等。而万回一线在书序中也对“直截根源”作出解说——“其直截根源者，法王之所印，大师之所望也，是故标以为名焉，读者莫摘叶寻枝”。从中可见，其希望读者不要滞留于《证道歌》文字表面，不执着于法外之相，而是要直截了当地去追寻佛所印证的涅槃之道——这既是佛之所印，也是永嘉大师之所望。

相比前文所叙《证道歌注解》《证道歌钞》《证道歌注》《冠鳌证道歌》四种，《证道歌直截》是一部注解更为详尽的专书。万回一线将《证道歌》二百四十七句拆分为一百零五章句，逐章进行解读：卷上从“君不见”起，至“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结束，共分五十三章句；卷下从“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起，至“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为君决”结束，共分五十二章句。其注文主要特色有三点。

其一，重视《证道歌》全篇之义段结构划分。注文指出“君不见，绝学无为闲道人，不求妄想不求真”三句为《证道歌》全篇纲领所在，云“上十七字犹如自序。今此二句，一篇纲领：曰无明也，曰佛性也，曰幻化也，曰法身也”，并认为“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等句为《证道歌》各部分意旨之总结，谓“此二句结上义”云云。

其二，释、证、评兼具，且极富论辩色彩。在注释过程中，面对有争议的解说，或前人批注

[10] 日本禅学大系编纂局所编《禅学大系》已将此书收录，有东京一喝社1911年版。

[11] 释道原.景德传灯录[M]//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276.

[12] 释道原.景德传灯录[M]//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284.

不甚详明处，万回一线往往先引他人之说，然后以“《直截》云”“《直截》又云”“《直截》评曰”“《直截》议曰”等述说自己的看法。针对不合理的意见，他往往径直指出：

换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 今此二句，其义明白，佛海、南巢不能读之，解得莽卤，被大师瞒……《宝积》《华严》《大论》皆有机关木人之文，其义皆如此。《证道歌》文义皆祖述乎经论，而佛海昧，源流、释义颠倒错甚矣。《直截》评曰：“独庵智见，明白如是。独语惊人，不但是已。予之所解，似异实同，后学并看，知其不错。”

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 上句承“净五眼”，下句承“得五力”，古今注者不得之意，异说纷纭，解得愈失。盖夫肉眼、佛眼本无二见，痴力、慧力所用岂异？镜里看形，胡汉不差，故云“见不难”。水中捉月，光境俱失，故云“争拈得”。

其三，注文富含文采，表述诗性。如：

证道歌 永嘉大师无师自证菩提，吟咏以明其道，所以名《证道歌》也。道也者何？自心法也。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古今一辙，凡圣同归，道若大路然，是名。无上道尽乾坤大地，是个解脱门。头头我，物物渠，夜月出而水明，春风吹而花开。露堂堂，明历历，不假修治脱体。现成日用而不知，不知最亲切。木人歌，石女舞，今日大好曲调，有力之人相共击节。

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未君决 音声语言，相好文字，烦恼菩提，生死涅槃，迷悟凡圣，断常有无，因果得失，大小偏圆，以如是等僻见佛法，譬如以管谤天小也。佛法不是者个道理，汝若未了，吾今为决。有疑而不问，自甘增上慢。未得谓得，未证谓证，虽如来在，争奈渠何？末上言“君不见”，最后言“为君决”，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大师本意，唯是而已。未了底人，今日不决，萎萎随随，更待何时？光阴可惜，时不待人。莫徒贪著闲名破利，抛却此个大事因缘，慎哉，慎哉！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

这些做法，在《证道歌》中日注本中都属首次。尤其是《证道歌直截》对传入日本的中国释彦琪注本、释永盛注本进行了大量的回应和讨论，实属罕见。此外，《证道歌直截》常引《涅槃经》《楞伽经》《释摩诃衍论》《大智度论》《宝积经》《华严经》《圆觉经》《顿悟入道要门论》《仁王经》《圆觉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经论以释证，可见其注释又是建立在阅读大量佛教文献基础之上的。不过，该书注文用辞不拘一格，多带有万回一线的个人色彩，也削弱了该书的学理性。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数次引用曹洞宗独庵玄光所注《证道歌》之语，而独庵玄光之著已佚，其内容便可从此书窥见一二。此书之外，还有古田梵仙《增注证道歌直截》、佚名《证道歌直截事略》^[13]等补充讨论之作，可参看。

六、《增注证道歌直截》

《增注证道歌直截》二卷，古田梵仙著。古田梵仙，生卒年不详，江户末明治初在世，岐阜县人，曾任信浓国（今属长野）盛泉寺住持、爱知县大圣寺住持等。除《增注证道歌直截》外，还著有《标注傍解吉祥山永平寺众寮箴规》《增冠佛祖三经指南》《增冠弘智禅师颂古》《增冠傍注永平元禅师清规》《冠注信心铭夜塘水》《归震川赖山阳二大家文则》《增冠加解参同契宝镜三

[13] 《证道歌直截事略》，《禅籍目录》著录，注“延享五（写）”，不注撰人。参见：高田仪光. 禅籍目录[M]. 京都：驹泽大学图书馆，1928：350。

昧不能语》《增冠傍注护法论》《标注法眼禅师十规论》《冠注拈评三百则不能语》《增冠傍注宝庆记》《增冠傍注永平初祖学道用心集》《头书曹洞二师录》等。所谓“增注”“增冠”“标注”“傍解”“傍注”等，乃是对前人已注之书采用旁批的方式进行再注释。

《增注证道歌直截》首刻于明治十四年（1881）八月，现存驹泽大学。书前附《证道歌直截序》及《永嘉真觉大师略传》。《永嘉真觉大师略传》内容系《景德传灯录》《宋高僧传》中玄觉传记整合而成，正文中有关名训读符号。《增注证道歌直截》分乾、坤二卷，它们大致对应于《证道歌直截》之卷上、卷下。《证道歌》开篇至“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为乾卷，“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至“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为君决”为坤卷。在排版上，古田梵仙增注之文不并入《证道歌直截》正文，而是在原书板框外的上部、左右两部使用小字单独排列。在批注方法上，古田梵仙同样采用了将《证道歌》拆分为章句并逐章逐句进行增注的做法。为减少文字刊刻之烦，每章句采用略称，如“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略称为“顿觉——中圆”。

《增注证道歌直截》虽名曰“增注”，但其注文既不对万回一线之文作补充讨论，也不对其指误纠谬。就风格而言，《增注证道歌直截》与前文所叙《证道歌注》《冠鳌证道歌》相近。不同之处在于，毛利贞斋、骏阳陈人大多只作征引而不作具体释义，古田梵仙则是释证兼具，试看以下两例：

穷释子，口称贫 释者，释迦氏也。《阿含经》云：“四河入海，无本名，四姓出家，同一称释氏。”释迦，此云“能仁”。口称贫者，乏财云贫；口自称贫道，犹云贫道法，谦辞也。《僧史略》云：“沙门对王者，汉魏两晋云贫道。”

香象奔波失却威 香象者，喻权教菩萨，及二乘权教菩萨，及二乘虽悟法空理、未明一乘圆顿之法，故忽闻圆顿狮子吼说法，则惊怖奔波失却威。香象者，毛吼出香气。故《优婆塞戒经》云：“如恒河水，三兽俱渡，兔不至底，浮水而过；马或至底，或不至底；象则尽底。”中士香象亦闻狮子吼说，半信半疑而惊。香象渡水，本彻底然惊，故奔波。上与兔同样者，失威也。诸天龙王宿世植大乘种子，故寂听圆音狮子吼，生欣悦心也。

古田梵仙曾经为多部佛典作过“增注”“标注”“傍注”，对佛教经律论疏很熟悉。《增注证道歌直截》引用书目可分三类：一是早期佛典，如《名义集》《大智度论》《圆觉经疏》《大乘五阴论》《法华经》《法句经》《大乘义章》《法界次第初门》《俱舍论》《成唯识论》《维摩诘经》《仁王经青龙疏》《普贤观经》《涅槃经》《大乘止观法门》《贤愚经》《大乘起信论疏》等；二是唐宋僧人撰述的禅宗史传、语录，如《六祖坛经》《大宋僧史略》《禅源诸诠集都序》《心赋注》《百丈录》等；三是常用小学之书及佛教辞书，如《说文解字》《集韵》《释氏要览》《祖庭事苑》等。

该书之难能可贵者有二。其一，不局限于释词释典故，而是站在永嘉大师立场，结合其悟道经历，对每一句歌辞进行深入剖析，并试图还原歌辞的写作原因及写作过程。比如，古田梵仙指出：玄觉写作《证道歌》的原因是“欲使佛祖证道样子施之朝野，无真无俗，咏歌以证入佛祖之道，以歌之文体述证道之旨，落草之为人也”；歌辞首三字“君不见”是预示“永嘉大师以自证之法告天下之学人也”；“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沙劫”是“大师恐人不信，故立誓也”；“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是“永嘉大师恐后人滞在空无中，故言自心实相中，无相无真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如实相寂灭境界也”。其二，在对《证道歌》所提倡修行方法进行解读的同

时，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比如，古田梵仙指出《证道歌》反对“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等实质上都是“不立文字”的另一种表达，且对此明确表示“不当理也”，并举诸例以驳之——“永嘉看《维摩经》大悟，天台读《法华》，悟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安楞严看《楞严经》大悟。若云经论无益，则佛因什么说若干经？马鸣、龙树等因何说许多论乎？”

《证道歌直截》与《增注证道歌直截》，以章句形式注解《证道歌》，既释歌辞以明读者，也重视阐发注者个人意见，这在《证道歌》日本注解书中是另一种独特的风貌。

七、《鳌头证道歌》

《鳌头证道歌》一卷，等摄道著。等摄道，生卒年不详，明治前期在世，爱知县人，曾住爱知县成道寺，与日本曹洞宗僧、同县正眼寺住持涛听水禅师交情甚笃。明治十一年（1878）九月，涛听水召集爱知县下爱知郡上中村、木村奇美及道俗等数名，一同为等摄道刻印出版《鳌头证道歌》，并为该书写序。

所谓“鳌头”，也称“头注”，乃是主要应用于江户、明治时期的一种刻印汉文注书方式^[14]，即将原文和注文置于同一板框内，采用注文在上、原文在下、中间用栏线分割的布局。一般情况下，注文约占板框四分之一篇幅，原文约占四分之三篇幅。这样的刻印注书方式在日本很常见，采用同样刻印方式的还有石川鸿斋《鳌头音释康熙字典》、太安万侣《鳌头古事记》、神仙宗八《鳌头学道用心集》、大芦利七《鳌头论语》、中岛辰夫《鳌头千字文》等。

涛听水在该书序言中交代了等摄道作《鳌头证道歌》的缘由。他们认为，当时《证道歌》“虽有一二之注，然多涉歧路”（即认为现存一些注本曲解了《证道歌》的原意），因此写作《鳌头证道歌》以正其本。该书注文简略，一般不对《证道歌》中涉及的佛学概念、典故、命题等作过深的阐发。比如，释“五阴”云“色、受、行、想、识”，释“三毒”云“贪、嗔、痴”，释“象驾”云“菩萨乘”，诸如此类，不加赘言。对于需要作深入阐释的语汇，该书也只引一二书注释之。在所有《证道歌》日本注本中，此书乃后出者，故对前人之注多有参考引用，如文中常见的“琪注曰”“源注曰”“线注曰”等表述，即释彦琪、释永盛、万回一线之言。《鳌头证道歌》所引书目，亦多与《证道歌直截》《增注证道歌直截》相重。该书末所言“伏冀见闻缁素直截根源，不断支流，悖跳佛地”，表明该书当为面向普通佛教信士的普及读物^[15]。

从《证道歌直截》到《增注证道歌直截》，再到《鳌头证道歌》，意味着日本对《证道歌》的注解在江户末明治初已经进入了总结和深化阶段。万回一线、古田梵仙、等摄道等人已不再满足于前人释义，而是着重阐发个人见解，因而其注文体现出一定的批判性和总结性。

八、余 论

除以上七种注本外，日本尚有另外八种《证道歌》注本存目，内容惜未之见，相关信息简叙如下。第一种是《证道歌注》，梅天无明（1607—1676）著，驹泽大学图书馆编《禅籍目录》著

[14] 据潘超考证，“鳌头”刻书方式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其后东传日本，被改造成符合日本传统汉籍阅读习惯的“内中国（经典），外日本（注释）”的样式，并得到汉学家和书肆的广泛接受与模仿。参见：潘超. 中日汉籍出版中的“鳌头本”[J]. 古代文明, 2023 (2): 141-155。

[15] 明治时期多种图书出版目录记载“《鳌头证道歌》正价十二钱，邮税二钱”云云，据此可知该书应为流通市场的一般普及读物。

录^[16]。第二种是《证道歌注》，连山交易（1635—1695）著，有贞享三年（1686）刊本，《国书总目录》著录。第三种是《证道歌评注》，石门新干著，有元禄十四年（1701）刊本，《国书总目录》著录。第四种是《证道歌新注》，秃氏祐祥《书目集览》卷二著录^[17]，不注撰人。第五种是《证道歌注》，独庵玄光著，万回一线《证道歌直截》提及并引用。第六种是《冠注证道歌》，町原吞空著，存于《冠注十部录》内，《禅籍目录》著录^[18]，《冠注十部录》于大正二年（1913）由京都贝叶书院出版。第七种是《冠注证道歌》，上野义明著，《富山市立图书馆和汉图书分类目录》著录^[19]。第八种是《证道歌注解》，竺原道著，《佛典疏钞目录》著录^[20]。

《证道歌》自传入日本尤其是日本曹洞宗开创以来，在佛教界一直受到特殊礼遇，关注和研究热度经久不衰，其作者永嘉大师玄觉“震旦圣者”之名号也遍传日本。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这是一篇具有深厚内涵的弘法作品，其所提倡的修行方式得到广泛认同，以至于日本曹洞宗僧对其发出“圆顿之宗极，直指之要机”“禅关之枢要，别传之显诀”^[21]这样的赞美之辞，并将其视为法门正宗、证悟指南、弘法利器，《证道歌》也因此在日本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其二，这篇作品所采用的艺术形式，即古田梵仙所称“咏歌以证入佛祖之道，以歌之文体述证道之旨”的歌辞体说道形式，将深奥的佛禅义理用俗文学形式表达出来，使得普通信众更加容易地亲近佛法。这种形式也受到日本僧众的喜爱和仿拟，如：《日本洞上联灯录》记载元禄时期曹洞宗沙弥吟诵《证道歌》的事实^[22]；明治时期坦山和尚（1819—1892）则有感《证道歌》“名布四方，世遍知之”，遂“蹈其韵迹”^[23]，作《觉仙证道歌》。这表明，由永嘉大师玄觉开创的歌辞说道方式已经为日本禅僧乐见而采用。其三，禅宗选本的选录、刊印扩大了《证道歌》传播途径。早在镰仓末期，已有五山禅僧将《证道歌》与禅宗三祖僧粲《信心铭》、廓庵师远《十牛图颂》、无量宗寿《入众日用清规》及日本曹洞宗始祖道元《普劝坐禅仪》等四种短篇禅宗要典合刻，合称《五味禅》。其后，江户前期，元和七年（1621），日僧用吉活字印刷术合刻《证道歌》《信心铭》《十牛图颂》《普劝坐禅仪》为《禅宗四部录》^[24]。大正时期，居士伊阪诚之进又在《四部录》的基础上，加入宗教人士松村介石之《事天ノ一途》《虚心ノ歌》及佚名《庄子知北游附虞斋口义》等三种著作，编为《七味禅》。这一时期还有学者将法融禅师《心铭》、沩山灵佑《警策铭》、罗汉桂琛《明道颂》、贯休和尚《四字龟鉴》、仁俭和尚《了元歌》、乐普和尚《浮沤歌》等六种唐代僧人作品增入《四部录》，是为《十部录》。从这些禅宗经典选本的编选来看，《证道

[16] 高田仪光. 禅籍目录[M]. 京都: 驹泽大学图书馆, 1928: 351.

[17] 秃氏祐祥. 书目集览[M]. 京都: 东林书房, 1927: 38.

[18] 高田仪光. 禅籍目录[M]. 京都: 驹泽大学图书馆, 1928: 350.

[19] 富山市立图书馆. 富山市立图书馆和汉图书分类目录[M]. 富山: 富山市立图书馆, 1914: 3.

[20] 佛书刊行会. 佛典疏钞目录[M]// 佛书刊行会. 大日本佛教全书. 东京: 佛书刊行会, 1913: 37.

[21] 藤田玄路. 涂毒鼓续编[M]. 京都: 贝叶书院, 1922: 117.

[22] 岭南秀恕《日本洞上联灯录》卷十一载：“（加州大乘月周宗胡禅师）一日，在众寮闻沙弥诵《证道歌》曰：‘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身心器界恍如影响，从前碍膺物荡尽无余蕴。即说偈曰：‘一口吸尽四大海，无处藏身娑竭龙。洞水逆流流不竭，唯有今日契吾宗。’”参见：岭南秀恕. 日本洞上联灯录[M]. 东京: 鸿盟社, 1885: 23。

[23] 秋山悟庵. 坦山和尚全集[M]. 东京: 光融馆, 1909: 282.

[24] 此书又称《禅门四部录》《禅家四部录》，简称《四部录》。

歌》已成为禅门学人的必读篇目。而在前文详细介绍的七种注本中，万安英种《证道歌钞》、毛利贞斋《证道歌注》、骏阳陈人《冠鳌证道歌》三书有一共同点，即都是作为《四部录》注书中的一部分。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证道歌》在日本的流传和普及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像《四部录》这样的禅籍选本而进行。事实上，《四部录》的编刻也的确使《证道歌》获得了更广阔的读者市场。比如，小畠文鼎所著《续禅林僧宝传》（第二辑）卷中《岐阜县虎溪山潭海禅师传》记载：“（明治六年五月）净德为甲房，总三州中教院，师又主之，讲《四部录》《金刚经》等，接化缁素。”^[25]《广岛县佛通寺宽量禅师传》记载：“明治十六年三月，设菩萨大戒会于本寺。戒徒七百有余员，因讲《四部录》……癸巳，应备后妙音请，设菩萨戒会，且讲《四部录》。”^[26]《奈良县达磨寺六湛禅师传》记载：“（明治）二十一年十月，应明石淡泊会请，讲《临济录》《四部录》等于龙谷寺，接化居士。”^[27]这种禅师为学徒、信众讲授《四部录》的做法一直持续到日本近代，一批关于《证道歌》的讲义书也由此诞生，如山田孝道、新井石禅、北野元峰所撰之《证道歌讲义》等。

自圆仁、圆珍、慧运三人在平安初期将《证道歌》文本引入日本后，直到五百多年后的室町时代，日本才出现了由南英谦宗口述的第一部《证道歌》注本，这要比唐代玄机所作之《证道歌注》晚不少时间。不过，就内容的学理性和形式的规范性而言，《证道歌》日本注本的完善和成熟是在江户时期。在本文所叙的十五种《证道歌》日本注本中，即有九种属于江户注本。其中，毛利贞斋的《证道歌注》和骏阳陈人的《冠鳌证道歌》，无论从注释语言还是体例格式、征引书目看，都可视为典范注本。江户末至明治以后，虽又出现五种注本，但从目前可见的三种，即万回一线《证道歌直截》、古田梵仙《增注证道歌直截》、等摄道《鳌头证道歌》来看，其注文多引江户注本，征引书目也大体不出江户注本之范围，它们的主要贡献是为《证道歌》以及前人注本提供了批评和讨论意见。总结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三点认识。其一，关于《证道歌》日本注本的特点，若从作者身份来看，释氏之注引证书目多采佛书，多重重视阐发个人之解，方内人士之注所采书目则来源多样，多重实证。其二，江户以前日本注本多依赖中国传日《证道歌》注本，江户以后日本注本则异见纷呈，讨论气氛热烈。其三，《证道歌》日本注本的注文形态，先后经历了对话语录、只引不释、释证兼具、释证评并行四个阶段，这反映了《证道歌》在日本接受和阐释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些注本有一共同特征，即几乎全部依赖和采用中国典籍来注解《证道歌》。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关于《证道歌》的专门研究著作，有僧英了谛《证道歌摘叶录》、佚名《证道歌妄辨》、后水尾《证道歌闻尘》、赤松月船《証道歌の持ち味》、苧坂光龙《证道歌提唱》、井上义光《永嘉大师证道歌提耳钞》等多种，单篇研究论文则更不必言。这意味着，《证道歌》在日本早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其在日本的关注热度和研究数量，并不亚于它的诞生地中国。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佛教对日本之影响，以及中日佛教之交流，是伴随像永嘉大师《证道歌》这样的优秀弘法作品之传入、接受、注解和研究而发生的。

（编辑：张龙）

[25] 小畠文鼎. 续禅林僧宝传[M]. 京都：贝叶书院，1928：17.

[26] 小畠文鼎. 续禅林僧宝传[M]. 京都：贝叶书院，1928：101.

[27] 小畠文鼎. 续禅林僧宝传[M]. 京都：贝叶书院，1928：42.

Seven Descriptions of the Japanese Annotated Versions of Yongjia Xuanjue's *The Song of Enlightenment*

LI 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011)

Abstract: Yongjia Xuanjue's *The Song of Enlightenment*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Japanese Buddhist scholars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o Japan during the Heian period. Whether it was during the "Five Mountains Period" when Zen Buddhism was flourishing or the early Edo period when Zen Buddhism was experiencing a revival, *The Song of Enlightenment* was regarded as a powerful tool for spreading Buddhism in various Buddhist movements. For this song, which is rich in meaning and unique in form, Japanese scholars not only relied on Chinese annotated versions to understand its profound meaning, but also attempted to write their own annotated versions. The existing Japanese annotated versions of *The Song of Enlightenment* are mostly composed by monks of the Caodong sect during the Edo and Meiji periods, each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se versions reflect the growing acceptance and evolv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ng of Enlightenment* in Japan, highlighting its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Zen Buddhism.

Key words: Yongjia; Xuanjue; *The Song of Enlightenment*; Song Lyrics for Preaching; Zen Buddhism in China and Japan

（英文审校：黄璐）